

土家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独具魅力与深厚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民族智慧和精神价值。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张家界为样本，这里的土家文化既保留着茅古斯舞、西兰卡普织锦等古老技艺，又面临着现代化转型的挑战。面对新挑战，土家族文化传承发展须探索出一条激活土家文化生命力、铸就其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有效道路，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一、解锁土家文化密码，传承文化精髓（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对于传承发展土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张家界永定区土司城遗址中，我们能看到土家文化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历史见证。这里的石雕、建筑既保留了土家吊脚楼的独特风格，又吸收了汉族建筑的精巧工艺，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土家族的《梯玛神歌》以古老唱腔传承千年，其内容既包含土家先民的自然崇拜，又融入了儒家“仁爱”思想，这种文化叠层正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鲜活例证。土家文化以其鲜活实践，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也为当代文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我们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土家文化的优秀基因，使其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张家界武陵源区的溪布老街，传统与现代实现完美融合。这里举办的“三月三”情人节活动，既保留了土家青年对歌择偶的古俗，又创新加入现代灯光秀和VR体验。特别是土家织锦技艺，传承人将传统西兰卡普图案与现代服饰设计结合，推出的系列文创产品在2023年湖南省文创大赛中获得金奖。桑植民歌传承人将

文化“破圈”的张家界样本：土家文化精髓的当代解码与国际表达

■ 卓青青

古老的“哭嫁歌”改编成交响乐，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热烈反响，这些都是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实践。张家界慈利县板栗板龙灯艺术节是张家界市探索出的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路径，通过结合时代创新工艺与形式，保留传统又符合现代审美，吸引年轻人传承，注入活力，体现了对文化的自信与担当。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推动土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 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文化遗产，更要在心里传承好。在张家界天门山下的土家风情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园内完整保存着32栋明清时期的吊脚楼，其中“冲天楼”不用一钉一铆，全凭榫卯结构支撑，堪称建筑活化石。每天举行的“茅古斯”祭祀舞表演，演员们戴着棕叶编制的面具，再现土家先民的狩猎场景，让游客直观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学校开设的“非遗小课堂”，邀请传承人教授孩子们打溜子、织锦等技艺，确保文化薪火相传。2023年，张家界“土家年俗”保护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秀实践案例，标志着保护工作获得国际认可。张家界市慈利县板栗板龙灯艺术节通过精心策划龙灯、点龙睛、万人巡游等深度互动环节，吸引本地居民与八方游客亲身参与、沉浸体验。人们在亲手触摸、共同欢庆中，真切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由此唤醒文化基因，滋养文化认同，并自发升华为守护文化遗产的责任意识。我们必须以这种“活态传承”与“心灵浸润”并重的方式，加强对土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赓续，确保其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永续流芳，为子孙后代守护好这份融入血脉的精神命脉与文化瑰宝。

二、激活土家文化产业引擎，推动事业繁荣发展（一）科技赋能激活产业新动能，市场引领开辟繁荣新格局

土家文化发展得益于科技与市场双轮驱动。科技上，运用全息投影、AR互动技术，对“茅古斯舞”等非遗沉浸式再现。如张家界某景区引入后，游客参与度提升65%，能更深入感受其原始文化魅力，还拉动了文创产品销售，复购率达38%，印有相关元素的钥匙扣等小物件受游客喜爱，为传统注入现代活力。市场方面，依托“云端织锦”等电商平台，推动西兰卡普织锦等特色产品线上销售。张家界织锦作坊入驻后，某平台年交易额破亿，拓宽渠道、增加传承人收入，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开拓新格局。

（二）政策支持夯实事业根基，企业参与拓展文化影响

政策与企业参与保障土家文化繁荣。政府设专项基金，修复土司城遗址等历史建筑，建吊脚楼群等文化地标。张家界市政府投入资金修缮土司城，其成展示历史文化窗口，吸引众多游客。文化企业担当主角，开发融合土家元素的实景演艺，年演出数百场成营收主力；还借助综艺推广“打溜子”等文化符号。张家界一演艺公司打造桑植民歌主题实景演艺，与综艺合作让“打溜子”走红，拓展传播，提升影响力。

（三）人才筑基注入创新活力，品牌塑造提升文化软实力 人才与品牌是土家文化发展的核心。人才筑基上，推动高校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张家界高校与织锦传承人合作，学生习传统技法并结合现代设计，开发出受欢迎的织锦产品，促进传统与现代融合。品牌塑造方面，策划举办文化节庆、民俗技艺大赛等活动，打造文化品牌。张家界“土家文化旅游节”成为标志性活动，节日活动丰富，吸引海内外关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与竞争力。

三、搭建土家文化传播桥梁，提升文化国际影响（一）深挖核心价值，夯实文化根基

系统梳理摆手舞、西兰卡普织锦技艺等国家非遗，多维度挖掘内涵价值。学术研究上，近5年围绕摆手舞开展30余项课题，发表100余篇论文；西兰卡普织锦技艺有20余部专著问世。展览展示成果显著，张家界每年非遗展览吸引超50万游客，民俗文化节期间摆手舞表演观众累计达20万人次以上。文艺创作领域，电影《土家新娘》票房破5000万元，电视剧《西兰卡普情》收视率多次进入同时段前三。通过这些形式阐释技艺传承与文化内涵，提炼团结协作、敬畏自然等积极价值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土家族作家小说《山魂》发行超30万册、微电影《同舟共济》播放量破1亿次，增强了文化认同感，筑牢影响力基础。

（二）强化传播交流，拓展文化版图

充分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及主流媒体平台，制作发布短视频、纪录片等数字内容，扩大传播广度。抖音土家文化热门话题播放量超50亿次，“土家摆手舞教学”短视频最高点赞200万；快手相关创作者粉丝量超5000万。纪录片《土家风情录》在央视播出，收视率最高达1.5%，覆盖超1亿人。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组织文艺团体海外展演，举办国际研讨会与展览，向世界展示土家歌舞戏曲等艺术精髓，增进国际理解，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张家界土家艺术团赴10余国展演50余场，平均每场观众1500人左右，累计吸引7.5万海外观众。国际研讨会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专家，发表50余篇国际学术成果。国际展览中土家文化产品受赞誉，现场交易额累计达数百万，提升了中华文化影响力。

（三）推动融合发展，保障人才支撑

依托土家族聚居地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底蕴，深化文旅融合，打造特色景区与线路，发展文化旅游，既带动经济又强化文化感知。张家界打造“土家风情园—天门山”等特色线路，年接待游客量从500万人次增至1000万人次以上，

旅游收入从300亿元增至700亿元。土家风情园门票及园内消费年增长率15%以上。鼓励以土家文化元素开发创意产品，推动产业融合，激发创新活力。张家界文化创意产业园土家文化主题产品达1000余种，年销售额超5亿元，如土家织锦图案手机壳月销量达10万件以上。同时，人才保障是核心：需在基础教育中融入土家文化课程，加强高校专业建设，并制定激励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培养既懂传统又具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土家文化的持续繁荣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坚实保障。张家界80%以上中小学将土家文化纳入校本课程，年培训相关教师200余人。当地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在校学生1000余人，年输送专业人才200余人。政府设立1000万元专项基金，支持人才培养与项目开发，为土家文化繁荣与影响力提升提供保障。这三方面相互支撑，共同构建土家文化传承创新与影响力拓展的有机生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土家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新时代，我们唯有系统施策、综合发力。在传承发展层面，需根植中华文明沃土，坚持“两创”方针，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心灵传承，激活传统生命力；在事业产业层面，必须构建科技、市场、政策、企业、人才、品牌紧密联动的综合生态，以创新驱动繁荣，以产业反哺传承；在影响力提升层面，则要深挖核心价值，拓展传播维度、深化融合发展，并筑牢人才根基，方能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性跃升。这三重路径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土家文化传承创新与影响力拓展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土家文化必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征程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注入强劲的土家力量。

基金项目：2024-2025年度张家界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生态张家界建设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zjxskl2024141）（作者单位：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节庆视域下舞狮文化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践

■ 张亚敏

传统节庆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集体智慧，是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其蕴含的仪式符号、情感纽带和伦理规范为思政教育提供鲜活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就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节庆文化作为民俗载体的独特性，其舞狮文化在节庆场景中也具有着精神象征意义，为民族地区高校提供具象化思政教育方案，解决传统思政课堂“抽象化”问题。

一、节庆文化、舞狮文化与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契合

节庆文化与舞狮文化的共生关系，舞狮是节庆活动的核心“仪式符号”，例如，春节舞狮驱邪纳福、元宵舞狮闹灯助兴，在民族地区的特色节庆中，如广西“三月三”、云南“火把节”等活动中，舞狮与本土民俗的相融合。

（一）舞狮文化与思政教育的价值共鸣 舞狮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具代表意义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象征，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有文化符号地位。舞狮分为南狮和北狮，文事与武备兼具的北狮，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南狮，北狮的刚劲、南狮的灵动，舞狮表演中的“团结协作”精神就契合了集体主义教育，“勇敢采青”就呼应了奋斗精神的培育。体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契合民族地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要求。

（二）节庆场景对思政教育的赋能作用 节庆活动提供的是“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让思政教育从“理论灌输”转化为“实践感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思政教育教学质量，从而提升育人实效。

（三）文化传承与育人目标的协同共进 文化传承与育人目标的协同共进，是节庆文化、舞狮文化与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突破单一的功能边界，使文化传承形成具有温度的育人模式，具有文化深度的思政育人，丰富高校思政教育内在契合的内涵。

二、节庆视域下舞狮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挖掘

（一）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中国舞狮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断在中国乃至世界发扬光大，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观念，强调了团结协作的社会理念，构成了中国舞狮文化价值理念传承与创新的突出表征。

（二）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促进文化互鉴 舞狮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传承与创新的互动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传统元素的保留与演变、现代舞台表演、观众参与、互动、文化节和活动等多方面：舞狮贯穿东南西北，在民族地区高校学生共同庆祝节庆活动，参与舞狮活动，了解不同民族对舞狮文化的创新发展，强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认知，让传统舞狮文化从校园中“活起来”。

（三）培育家国情怀，实现实践育人价值 中国56个民族中，除汉族外，各少数民族均具有自己独特的节庆文化，部分民族甚至有多个重要节庆，目前经文化部门整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特色节庆超100项，涵盖生产、祭祀、社交、纪念等多种类型。在节庆中，以舞狮表演活动为载体，结合民族地区发展历程，深化学生对国家与民族的归属感。

此外，节庆舞狮表演前的“拜师礼”以及“团队彩排”，这里面就渗透着尊师重道、严于律己的道德观念，通过学生实践实现育人价值。

三、节庆视域下舞狮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创新路径

（一）构建“课程+节庆”融合体系，深化教育深度

构建“课程+节庆”融合体系是深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关键路径。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中增设“舞狮文化专题”实践课时，以及体育专业学生开设舞狮文化教育课程，将民族特色节庆活动与舞狮文化、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编写《民族地区节庆文化与思政教育读本》，收录民族地区各地方特色节庆舞狮案例，如广西“三月三”、云南“火把节”等节庆中的舞狮表演。强化舞狮文化表演中所蕴含

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以构建课程与节庆活动相融合，打破单一的理论课程模式，既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又让思政教育更具渗透力，有效深化思政教育深度，助力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

（二）完善“校地+节庆”协同机制，强化资源支撑

完善“校地+节庆”协同机制是破解民族地区高校舞狮文化思政教育资源短缺的关键路径，通过校地合作模式，与地方政府、文旅局、非遗传承中心、文化馆、社会舞狮协会等共建“舞狮思政育人实践基地”，依托民族特色节庆活动，邀请舞狮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现场教学，成立校园舞狮团队，强化资源整合，主动对接地方节庆活动，将高校节庆舞狮活动纳入地方节庆文旅活动项目，既是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又将思政教育延伸至社会服务场景。

（三）搭建“数字+节庆”传播平台，扩大教育广度

搭建“数字+节庆”传播平台是突破时空限制、扩大舞狮文化思政教育覆盖面重要实践路径，利用数字技术与民族地区节庆中舞狮表演的特色，构建线上体验与新媒体传播的双轮驱动模式。如开发VR体验课程，模拟特色节庆场景，还原舞狮表演的服饰细节、动作流程与文化背景，感受节庆与舞狮文化的内涵，在场景中解读“团圆和和谐”的家国情怀价值。此外，通过网络平台，与地方非遗文化部门联合将高校舞狮文化活动现场纳入民族地区文化数字库，实现“校园思政教育”与“地方民族文化传播”的双向赋能，进一步扩大舞狮文化思政教育的辐射范围。

综上所述，节庆视域下舞狮文化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践，既是培养高校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又是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育人的实效性，切实有效地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认同，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思政育人的协同共进提供有利支撑。

基金项目：2025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传统节庆文化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挖掘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5LSZ029）

（作者单位：梧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相结合的三重逻辑

■ 王昕伟¹ 薛菲²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它系统揭示了人类教育的本质属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重要理论，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探索实践中，也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结合，从而加快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不断推动中国的教育变革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结合也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教育发展的独到观察思考，和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价值追求。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的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同样，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之间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正是这种内在契合性，成为二者相结合的重要前提和理论基础。一是在教育的价值目标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与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兼士”“贤士”的目的相合。如马克思认为教育应当促进人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与孔子的“四教”“六艺”墨家的“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等教育观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强调教育的全面性、注重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二是在教育的受众对象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强调“教育的阶级性”“教育的普及和优先”等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倡导“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施而不费”等理念相通。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教育应当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应让每个公民都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推动社会发展。这就与孔子打破贵族教育垄断，根据学生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学有所成出任为官“兼济天下”的主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教育的阶级性、公平性、注重教育对象的发展性。三是在教育的原则与方法方面，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与中国传统教育提倡的学以致用主张相融。马克思认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是教育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改造现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因此十分重视技术教育。这就与墨家重视生产知识技能教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提出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性人才等观点具有紧密的关联性，都强调了教育的现实性、实用性，突出了教育的价值性。

二、历史逻辑：近代中国从传统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探索与启示

近代中国是传统封建社会逐步解体并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而与之相随的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近代中国教育，也在这时期发生着剧烈变革。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在教育内容、方式、理念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文明的脱节，严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近代中国教育何去何从？这就迫切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动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为此，各阶级各阶层的有识之士聚焦“教育救国”，开始了推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实践探索。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先进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经著书立说，介绍外部世界、先进技术；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开展洋务运动，通过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

生等，着意学习西方的自然科技和军事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教育兴民，进而强国”，在戊戌变法实践中推行“废八股”、改革学制等举措；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主张培养资产阶级新国民，并实施了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改革，在教育宗旨、制度、内容等方面肃清封建教育影响，构建新教育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又高举“民主”“科学”大旗，试图通过改变教育内容改造国民性。毋庸置议，这些实践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然而拘泥于特定历史背景和自身身份局限性，他们在处理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传统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等关系问题时，往往有所偏颇，或一味抱残守缺偏于保守，或一味崇洋媚外全盘西化，都未能充分立足近代中国的教育国情，因而最终也未能构建起系统科学的现代教育体系。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迫切需要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指导思想。

三、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百年实践

教育关乎着民族、国家未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中国的教育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分析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并在领导中国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要为广大无产阶级服务，创新教育形式，并注重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批判和扬弃。毛泽东明确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教育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对旧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明确了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并逐步建立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新型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特别是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更加注重教育公平，强调素质教育，形成了邓小平教育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相结合、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教育强国建设。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青年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思想相结合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示研究”（项目编号：XJK23QJG001）

（作者单位：1.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从理想信念到群众路线：长征精神的系统性解读

■ 卞雪迪

伟大长征铸就了长征精神，聚焦长征精神展开深入剖析，对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建设方面，展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长征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理想信念、斗争精神、实事求是、集体主义以及群众路线五大方面。

一、理想信念

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作为理想信念，长征的理想信念根植于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我们党把“推翻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作为理想信念追求的目标。长征中形成的“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就是从党的理想信念中孕育而出的。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让沿途人民群众认识到我们党的革命目标和理想信念。

长征时期的理想信念对推动民族解放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在长征初期就确立了“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将理想信念与抗日救亡深度融合，使革命目标从反“围剿”的阶级斗争层面，跃升到“抗日救国”的民族使命高度，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线的建立奠定了思想根基。

二、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是长征中无产阶级革命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红军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为了改变人民群众被三座大山压迫的现状，以及表明北上抗日的决心，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四道封锁线，途经14个省。可见，红军在长征中所展现的斗争精神是具有坚决性的。在长征背景下，只有坚持贯彻党的革命斗争政策，以武装的革命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把握革命斗争规律的同时发挥红军的革命斗争精神，才能实现社会变革，推动历史的发展。

湘江战役是红军斗争精神的光辉映照。不论

是红军以巨大伤亡代价在新圩、脚山铺、光华铺完成了三大阻击战，还是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践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都体现出红军“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和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在充满危险的长征途中，红军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斗争求生存、以斗争谋发展。

三、实事求是

长征初期的挫折反映出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性。王明“左”倾路线坚持以苏联经验为主，忽视中国与苏联在国情上的差异性，背离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这种经验主义的行为是与列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论断背道而驰的。

遵义会议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自发”走向“自觉”。会议果断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革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使得实事求是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遵义会议实现了从“本本主义”到“问题导向”的转向，开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认识论革命。

四、集体主义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具有历史具体的统一性。由于长征中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处于反革命势力围追堵截之下，集体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必要性。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红军的行为规范到《长征组歌》中“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都体现出红军将士将个体价值融入集体目标，将革命事业的集体利益置于首位。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实现了个人利益与革命事业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集体主义原则对局部利益的整合与超越。

集体主义精神是长征胜利的重要组织保障。面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党中央既坚持原则性（通过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又保持策略灵活性（未轻易开除张国焘党籍），这一决策体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思维和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智慧。

五、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长征精神的本质特征。红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要求、帮助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行动，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具体实践，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可见，红军的革命目标（推翻剥削、实现民族独立）与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具有一致性的，这种“利益一致性”使得群众路线拥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得到群众的情报支持；在“强渡大渡河”中，船工群众在运送部队上发挥出关键作用。人民群众在长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夹道欢迎到踊跃参军，都体现出人民群众对长征胜利的推动作用。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印证了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论断，同时也深化了对“人民主体性”的理论认知。

六、结语

长征精神的五大核心内涵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了完整的精神体系。理想信念提供思想指引，斗争精神彰显实践品格，实事求是确保理论正确，集体主义强化组织保障，群众路线夯实力量基础。在新时代，深入研究和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理论升华，更是传承红色基因、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